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编

第四届章黄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陆宗达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研讨论文

为继承国故而发展学术，为坚守师说而吸纳新知

——在第四届章黄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陆宗达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王宁

季刚先生的句读理论是研究古代韵文语法的指南

王大年

对非议或误解黄侃古音学的澄清(上)

李葆嘉

文献语言学

——陆宗达先生秉承章黄的学术精华

冯胜利

陆宗达、王宁先生学术的渊源、传承与发展

宋永培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文始》比较研究

——以同族词比较为例

朱乐川

民俗学

党性民间文艺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董晓萍

“舜子变型”故事在中日两地的流传变异

陈泳超

“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的民俗学考辨

——“嚏”的民俗文化义

杨贺

文献学

《永乐大典》编纂、辑佚与语言文字学古籍(上)

鲁国尧

康熙朝文人对宫廷藏书的阅读与利用

——以朱彝尊为线索的考察

于翠玲 刘冰欣

乾嘉笔记中的《说文》词义考证初探

蒋亚龄 齐元涛

文字学

新中国以来的甲金文研究

罗卫东

读《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札记两则

陶曲勇

词汇研究

两汉方言词的渗透融合式发展演变

吴吉煌

音韵学

关于陆志韦先生的古音学思想

李开

神珙本五音图的性质

丁锋

金代《新修玉篇》注音例释

赵晓庆 张民权

朱熹在训诂实践中的语音学思想述评

贾璐

博士生论坛

段玉裁《诗经小学》的考据方法及其影响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

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看章太炎对古音学理论的应用

董婧宸

张蒙蒙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商务印书馆

第十七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17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234-4

I. ①民… II. ①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K892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85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ǎNJÍ WÉNZÌ YANJIU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七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234-4

---

2016年6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8 1/4

定价:52.00元

# 文献语言学\*

## ——陆宗达先生秉承章黄的学术精华

冯胜利

**提要：** 本文试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理解和诠释陆宗达先生在继承和发展章黄学术精华时提出的“文献语言学”的概念及内涵。文章首先以作者从先生受业十数年之所学为基础，体会和总结先生何以反复强调“文献语言学”之意义及原理所在。然后，分门别类对比索绪尔以来当代语言学分科的理论体系，讨论“文献语言学”与“历时/共时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文献语言学所蕴含当代语言学所有及所无而需发展的内容和领域，包括并不限于：结构主义原则（见《训诂浅谈》《训诂简论》《说文通论》）、文献语义学（首创同律引申）、文献语音学/音韵学（《中国声韵学》庚辰年荷月）、文献句法学（“了成句之理，辨字位所处”）文献字法学/文字学（如“野人与之块”之“由”，从字形（盛土于U）、字音（赧读为塊）及文献用例（《史记》“野人盛土器中进之”）的三维角度来证明）、文献韵律语法学（提出“音节句读≠句法句读”）、文献语体语法学（对季刚先生“文与言乖”“雅俗殊形”的继承与阐发）以及“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学术原则。

总之，由陆先生的文献语言学更可看出：章黄学派的文献语言学孕育了今天的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蕴含着发展当代语言学的新视角和新要素，是后代学者和未来学术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关键词：** 训诂学 文献语言学 章黄学派 结构语言学 韵律语法 语体语法

### 一

考“文献”一词，原出《论语》，其《八佾》曰：“文献不足故也。”郑注：“献犹贤也。”太炎《国故论衡·原儒》曰：“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又，《明解故》曰：“古文家依准明文，不依准家法。”是“文”为物，“献”为人；后世用为偏义复词，则专指“文”矣。而“文献语言学”者，乃“文字所记录之语言”之学。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金“乾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科学方法和理念研究”（项目批准号：15AYY009）的资助，特此鸣谢。



当代语言学之理论体系,肇自索绪尔。索氏之后则“历时”“共时”判若天壤。在中国,训诂、小学因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故不足与于当代语言学之科,亦不足与于西方之“历史比较语言学”。然而,自陆宗达先生“文献语言学”概念提出后,传统的小学才得以突破索氏“唯今是求”之当代语言学的藩篱。陆先生在《训诂简论》中指出:

训诂学曾经一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训诂学绝不简单地等于语义学,它其实包括了古代汉语研究的各方面的内容。<sup>[1]</sup>

陆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中更明确强调:

汉民族语言学的的一个主要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此说始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sup>[2]</sup>

注意,先生这里说的“书面语言”和现在学界讨论的“书面语”,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语言,后者是语体(见下);前者包括后者,但后者不含前者。自陆先生创造“文献语言学”这一术语之后,其他讨论者也纷纷而出。罗邦柱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谈道:

文献语言学亦称“语文学”“传统语言文字学”,我国古代又称为“小学”。汉文献语言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研究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各有所侧重:先秦侧重考证事物的名称。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主。《尔雅》、许慎的《说文解字》、扬雄的《方言》、刘熙的《释名》的出现,奠定了我国文献语言学的基础。魏晋兴起了对汉语语音的专门研究,同时词义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隋唐宋研究汉语语音趋向稳固、统一。元明则把语音研究引向实际。清代是古代语言学大总结的时期,上古音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较为科学的古音系统,促进了文字学、训诂学的发展,引起了整个语言学的变革。汉文献语言学源远流长,资料宏富,成就显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现在一般将文献语言学包括在语言学范围内。<sup>[3]</sup>

其中把“文献语言学”和“语文学”“传统语言文字学”等而同之,但作者没有看到“文献语言学”和后面两个领域的根本不同:“语文学”“传统语言文字学”是“用语言学来研究书面文字”(古代典籍中的文、史、哲)的学问,而“文献语言学”则不同,它是“以书面文字为材料来研究语言的学问”。这一点很重要,分辨不清则不解陆先生创造这一学科的本质和目的所在。弄清楚这一术语的实质所指之后,就可看出一般人对此理解的不足。譬

[1] 陆宗达《训诂简论》,第168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

[2]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第6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

[3] 罗邦柱主编《古汉语知识辞典》,第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如,如果说“汉文献语言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那么就等于把文献语言学限于三者之内;如果说“汉文献语言学源远流长”,那么也泯灭了陆宗达先生“文献语言学”划时代的突破与贡献。

什么是陆氏的“文献语言学”?本文指出:文献语言学是陆宗达先生提出的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它是先生从章黄学术的精华里提炼而出,结合当代语言学的根本精神发展而成的。然而,至今文献语言学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尚未得到世人的充分理解和应有的重视。本文抛砖引玉,以求同门、同寅的指教。

## 二

文献语言学与传统学术不尽相同,其超越传统之精蕴处,至少有如下数端:

1. 古代文献反映当时活的语言:“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文心雕龙札记·章句》);
2. 古文献中的词法、句法等语法现象与当代同类的语法现象,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3. 系统与结构的分析方法;
4. 其最高境界是用演绎法考证出“一串一串的同源词”。

下面就本着上面的基本原则,讨论文献语言学蕴含的原则与其中的分支学科。

### 1. 结构主义的原则

陆先生提出的“文献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就是“结构”主义的科学思想。他早在1964年就指出:“古代和现代语法,总的说起来,虽然差异比较小,但是古代的语言结构和现代的语言结构究竟是不一样的。”今天上古汉语是综合型语言、两汉以后是分析型语言的发现,证实了先生的结论。因此,先生告诫我们:“对于古代的语言结构,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分析,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去笼统地附会它。”〔4〕

为说明结构的重要,先生举出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如《诗经》中的语气词“其”:

其雨其雨,杲杲日出  
朝济于西,崇朝其雨  
夜如何其,夜未央

这里同一语气词(其)占据了三个不同的句法位置,反映出古今结构之不同。又如《红楼梦》:

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

〔4〕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52页,北京出版社,1964年。(以下出版社不重复注释)

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

陆先生说“这就是一个复合句的结构”。再如,《左传·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杜预注:“于私族之谋,宜立亲之长者。”同书里“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这句话,杜预注说:“言灵武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室人。”陆先生说:

这两处注都是解释古代语言结构特点——介词的宾语提前形式。前一句里的“长亲”就是“亲之长”,原句是中心语在前,定于在后。……后一句里的“室于怒,市于色”,则是“怒于室,色于市”的句型。<sup>〔5〕</sup>

这是典型的句法结构分析。再如,《孟子·梁惠王》:“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赵岐的《章句》说:“若此,安可哉?”陆先生说:

他(指赵岐)用“若此”解释“如之”,用“安”解释“何其”,也是语言结构的一种分析。以上这些例子,就都是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说明词义,句意的。

“结构”是索绪尔当代语言学的核心,文献语言学是从结构的角来解释词义和句意,是从结构的高度来整合和发展传统语言学中文字、音韵、训诂等学科,使之发展为“结构语言学”之分科学术。这,我认为,才是陆先生“文献语言学”的真谛之所在,而其所以如此者,乃承袭季刚先生“了于成句之理者,未有不能辨字位之所处者也”的“字位成句”的思想精华(=词的位置/结构)。

## 2. 文献语义学

陆先生文献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训诂学的发展:文献语义学。其中同源词的溯源、同源词词义之间语义引申的线索以及同源词系联,均离不开文献语义学的方法。这里介绍一种先生发明、但至今没有引起重视的义变现象:同律引申法。请看:

去	“孟子去齐”《孟子·公孙丑》
1. 躲避	“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左传·襄公二十年》
2. 拿掉	“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左传·闵公二年》
3. 杀掉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
4. 宽恕	“叔党命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除	
1. 躲避	“逃奔有虞,为之苞正,以除其害。”《左传·哀公元年》
2. 拿掉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左传·闵公元年》
3. 杀掉	“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左传·襄公二十年》
4. 宽恕	“请以除死。”《左传·昭公二十年》

〔5〕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51页。

陆先生说：

从“去”和“除”的对应的意义上，同样可以引申出“拿掉”“杀死”“宽恕”“躲避”这些意义。<sup>〔6〕</sup>

就是说，“去”和“除”遵循同一条“义轨”而发展，亦即：

去 1. 躲避 2. 拿掉 3. 杀掉 4. 宽恕

除 1. 躲避 2. 拿掉 3. 杀掉 4. 宽恕

后来训诂界出现的“同律互证法”“同步引申”“平行发展”以及“同义旁渗”“相因生义”等多种名目，其实都是“对应义的平行发展”这一基本思想的发展和延伸。

### 3. 文献语音学(音韵学)

陆先生曾谆谆教诲从学弟子们：

打基础是要先过古音韵这一关。我当年就是死记硬背过来的，其实也就用了半年时间。不过那半年可真苦，过来以后，一辈子受益。

先生早期的语音学著作有《中国声韵学》庚辰年荷月，而先生文献语音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语音的文献证据”。我们登门伊始，便受业“因声求义”的理论。因声求义之说肇自汉代训诂的“声训”与“音借”。《诗·东山》：“烝在栗薪。”郑笺：“古者声栗、裂同。”即是其例。先生本人对古代音韵训诂的发明，亦卓绝一时。难解之字，难明之义，一经先生的以音发覆，则豁然而解，怡然理顺。如：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何谓？先生破字曰：野马者，野廐也。《九叹·惜贤》王逸注：“廐，廐也。”一举而解千古之讼。

《战国策·齐策》“美人充下陈”。何谓“陈”？先生考证为：陈=墀，墀，堂途也。

凡此种种，不烦枚举。没有语音，不是语言；没有语音，不是文献语言学！

### 4. 文献句法学

《训诂浅谈》(第24—29页)专辟一节讨论句法结构与训诂的关系，足见句法乃文献语言学之重要领域。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曰：“然则了于成句之理者，未有不能辨字位之所处者也。”其中“句位”即今之句法结构之所本。譬如《诗经·小雅·棠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求矣，言兄弟也。”陆先生指出，这里毛亨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兄弟是求的宾语。……不要因为“兄弟”放在“求”的前面，就错认为它是“求”的主语(误以为和“原隰裒矣”平行：“原隰”是主语，“裒”是谓语，所以误以为“兄弟求矣”也是主谓结构)。

在句法分析上，陆先生非常重视表层结构相似但深层结构不同的区分。譬如《诗

〔6〕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48页。

经·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毛传：“漆沮之水，牝鹿所生也。从漆沮驱禽而致天子之所。”陆先生指出：

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平列的，而语法结构并不相同。……“漆沮”是“从”的宾语，这是宾语提前的句式，“之”字是宾语提前后加的字，实质上表示了“漆沮的牝鹿”的意思。……用从漆沮三个字来解释，就说明了这句话不是和“天子之所”成对偶的句子。

这种韵律对偶、句法异构的现象，即使是今天的句法学家，也很难避免不犯误判的错误。毋庸置疑，句法学(包括构词学)是文献语言学里面的一个核心学科。

#### 5. 文献字法学(文字学)

什么是文献字法或构形学？这是章黄学派所主张的、陆宗达、王宁先生在文献语言学里继承和发展出的一个重要领域：传世文献中汉字构形的结构系统，不同于业内大家常说的一般的文字学或古文字学(金文甲骨)。这一点不仅一直为人所误解，至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在地下发掘材料纷纷出土的今天，文献构形学就更没有机会得到它应有的重视。但是它自有不息的生命力，因为它深深根植于文献的基础之上，不仅字形结构的分析要本“一点一画皆有意义焉”的文献原则，更重要的是文字的点画之“意”有历时构意“重新分析”的观念：历时构意的重新分析必须要有文献的证据〔7〕。举例而言，《左传》有“野人与之块”之语，历来解者均取“农民给公子重耳一块土”这种不近人情的附会之说。陆先生从文献构形学上考出：块=土筐。为什么呢？这就是文献构形学的原理及功用之所在：《说文》“塊”的古文作“𡗗”，陆先生据此得出下面的结论：

这个字的结构很像是一种土装在U形的器物中，也就是说塊本来是一种装土的器物。〔8〕

于是，“野人与之块”在陆先生那里是“农民把食物放在盛土的草筐里给了重耳”。这自然可以独立成说，但对文献构形学来说，仍需文献证据。文献构形学的“构形分析”不是要“可备一说”，而是要“重构”当时的“语言”。我们要问：“与之块”在当时的语言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知道呢？这就是文献语言学里面的“文献”证据。陆先生用了两条文献证据说明上面的解释有当时人语感为证。

1)《礼记·礼运篇》注：“黄(筐)，读为块。”

2)《史记》“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

〔7〕 参冯胜利《论汉字形体的本质不在象形二字别异》，载于黄翔主编《繁简并用、相映成辉——两岸汉字使用情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2014年)，及冯胜利《古文字构形中的句法信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五辑，第21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8〕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43页。



由此可见,“野人与之块”的“块”是土筐的意思,不仅有字形上的证据,而且有司马迁的语言(=文献语言)证据,更有当时人的读音证据。综合古人的语音、语感和字形结构分析,严丝合缝,彼此咬合,这才是章黄派的“文献构形学”的最高境界与真谛所在。如果按照“文献”二字的初义来理解(文是文字,献是熟悉掌故的人),那么文献语言学的“文献证据”就不仅要有物证(文字证据),而且要有入证(语感证据)。

## 6. 文献韵律语法学

文献语言学的根本目的是重建古代的语言、发掘古语的规律。语言离不开声音,声音不能没有节律。章黄学派的一大特点就是从韵律上来发掘和构建古代语言的语法规律。注意:文献中的文字虽然是词语的记录,但唯有加之韵律,词语的记录才能变成活的语言。现代汉语里,无论单词还是只语,加上语调才是句子。因此,没有节律,不是语言。故曰:韵律乃文献语言学之魂。

我们知道,《学记》有言:“离经辨志。”陆先生解曰:“离经就是断文句的句读;辨志就是审辨经义的内容。”然而“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意之异”(《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为什么要“句读”“音节”和“文意”而二分呢?因为“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语言而以吟咏出之,则为诗歌。凡人语言声度不得过长,过长则不便于喉吻。……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意。”所以“文章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文心雕龙札记·章句》)。正因如此,《诗经》:“王命卿士,南仲太祖。”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陆先生说:“这就无异告诉我们,这两句诗的八个字,虽然在音节上要在中间一顿,但是文意却上下直注,不能分开来停顿的。”〔9〕不仅如此,陆先生还特别郑重地指出:

这种分析句读的方法和作用,不但是为了辨明诗句的意义,而且指出了研究诗歌句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文意的句读和音节句读应有不同的断法。……它告诉我们,必须认识音节和文意两种不同性质的句读,不能陷入音节里去讲文意,也不能专靠文意去分析句读,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文意句读和音节句读的对立,虽是季刚先生提出的,而其性质之不同则是颖明先生明确的;陆先生把它提升为一种训诂的原理和方法。冯友兰在《三松堂文集》自序中说:

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会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人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

赋古文以“调”,这是构建古代韵律语感的必经之路。从季刚先生到颖明先生,凡言训诂无不谈及“声度”与“节奏”,其所以乐此而不疲者,盖在于韵律乃语感之必也。乾嘉学者

〔9〕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21页。

发明“以声音通训诂”的破解方法，而章黄则进而发明“以声音通句读”的语言要谛。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建立的“韵律句法学”正是这一思路的当代延伸——“以声音通语法”。这样看来，“声度”“节奏”和“韵律”，同样是检验“文献语言学”体系化与否的一块试金石。

### 7. 文献语体语法学

文献语言学的另一领域是语体语法。《大戴礼记·小辨篇》：“尔雅以观于古，可以辨言矣。”陆先生说：“这里的‘尔’当‘依据’讲；‘雅’是‘雅言’，就是标准语的意思。”据此，《礼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据标准语来观察古语，就可以明辨语言（的语体）了。语体的不同，用陆先生的例子来说，《书经·尧典》最为显著：

协和万邦。……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宅嵎夷。寅宾出日。……厥民析。……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共工方鸠僝功。……有能俾乂。……方命圯族。师锡帝曰。……帝曰：俞。……克谐以孝。……不格奸。……厘降二女于妫汭。《史记·五帝本纪》：

合和万邦。……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居嵎夷。敬导出日。……其民析。……信饬百工。……众功皆兴。……共工旁聚布功……有能使治者……负命毁族。众皆言于尧曰。……尧曰：然。……能和以孝。……不至姦。……饬下二女于妫汭。

这是文献语言中古今体对应的范例。事实上，语体机制的发明，实肇自太炎先生。他在《文学略论》里说：

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之语为雅。

季刚先生对古代文学极富有天性，其所发明雅俗代降者，更具现代意义。在《黄侃日记》中我们看到：

宋词出于唐诗，元曲出于宋词，正如子之肖父，虽性情形体酷似，遭逢既异，行事亦殊。又雅俗有代降，其初尽雅，以雅杂俗，久而纯俗，此变而下也。雅俗有异形，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此变而上也。由前之说，则高文可流为俳体；由后之说，则典颂可变为丽词。然二者实两行於人间，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

言辞修润即成文章,而文与言讫于分乖者亦有。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此又无足怪矣。尝闻化声之道,从地从时。从地则殊境不相通,从时则易代如异国。……综上所述,文与言判……非苟而已也。

——《黄侃日记》第199页

陆先生秉承章黄的语体思想,在《训诂浅谈》及其他著作中深加阐发。譬如《诗经·邶风·绿衣》“心之爱矣,曷维其已”。毛《传》说:“忧虽欲止,何时能止也。”就是用串讲的方式告诉我们当时的口语语体(爱=忧、曷=何时、已=止)。

语体的构建,不仅“高文可流为俳体”,而且“舆颂可变为丽词”。《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这句话,是当时的古谚;杜预注曰:“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室人。”陆先生说:“(这)是解释古代语言结构特点:介词的宾语提前形式,是‘怒于室,色于市’的句型。”<sup>[10]</sup>显然,当时(春秋时代)的词序已经是[介+宾],而[宾+介]的上古句型几乎消失殆尽。《左传》的作者用句法结构不同的古谚语来讥讽楚王,其语气含意当从古今词序的不同上来分析和理解。这一点,非深知语体时空变异之律者,不得其解也。《典论·论文》有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先生的文献语言学在这方面不仅继承了章黄的语体思想,而且把它直接应用到具体的文献分析中来。最明显的就是先生对繇辞的解释。《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陆先生说古人所以如此断句者,是因为“繇辞是韵文,句读齐,正是这类文体的特点。”用“文体训诂”纠正了古人(贾逵、刘炫)“没有看到这一点”的“盲体”错误<sup>[11]</sup>。陆先生的文献语言学正是在这种“文体训诂”的实践中,为后代有原理、有体系的语体理论奠定了基础。

### 三

陆先生常常对我们说:

我这门学问,看似枯燥无味,整天就来回摆弄几个字儿。而你要是入进去了,用这个字串那个字,用那个字串这个字,像用绳串蚂蚱似的,那就有意思了。

陆先生用非常形象的语言道出了章黄学术的底蕴,中华学术旨在发明:“用这个字串那个字,用那个字串这个字”,不仅“字串”要创新,其方法本身也是一种创新。陆先生说

[10] 陆宗达《训诂浅谈》,第51页。

[11] 同上书,第54页。

“那就有意思了”，这是这类创新驱使的结果。著名逻辑学家蔡曙山教授指出：

科学发现和发明，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活动，它也是建立在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用语言来表征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用语言来思维，我们通过语言和思维来建构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我们通过语言和思维来建构科学理论和科学认知的模型。所以，科学是发明，而不是发现。<sup>〔12〕</sup>

“学术在发明，而不在发现”，这正是章黄科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吉川幸次郎在他的《我的读学记》里面回忆说：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但实际上要达到一个结论，其中运用逻辑，或归纳或演绎……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

季刚先生把用新材料做学问叫作“发现”，把用原有材料做学问叫作“发明”。吉川幸次郎又说：

“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因为“发现”是靠别人不知道的材料说话，而“发明”则是靠别人熟悉的材料但不知道的“奥秘和规律”说话，这就需要有更深厚的功力和更有力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吉川幸次郎说：“……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

“学重发明”是有很深的哲学与科学的背景的。当年顾颉刚先生刚刚从欧洲回来，受西方影响，认为一切事物都要重实证，只有亲眼看见的才能坐实。当他把这个道理说给老师章太炎先生听时，太炎先生反问道：“你有曾祖父吗？”顾颉刚笑道：“当然。”章太炎说：“那你见过他吗？”太炎先生对顾颉刚的责难是基于他对科学演绎逻辑的深刻认识：

（苏）轼使人跌边而无主，设两可之辨，仗无穷之辞……难乎有恒矣！……幸有顾炎武、戴震以形名求实之道约之，然犹几不能胜。何者？……来者虽贤，众寡有数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遍诏国民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已不得齿比于西邻耶？（《榷书·王学》）

“以形名求实之道约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科学演绎和科学实验为原则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如上所示，陆宗达先生的“汉语文献语言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冯胜利：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研究中心，100083，北京）

〔12〕 蔡曙山《语言、逻辑与科学发现》，载于冯胜利、李旭主编《语言学中的科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